

## 周室的仁政

徐道鄰

孔子的哲學思想，以『仁』爲中心，政治學說，以『周』爲理想，本是儒門內的老生常譚。這兩者雖然在邏輯上沒有其必然的關聯性，但是以『周室』代表『仁政』，在中國人的論著中，兩千多年來，似乎是一直如此。

可是，最近一連出了兩篇翻案的文章。

蕭公權先生在他的『中國政治思想史』民國四十三年版中，說『周政』有『法令滋彰』的傾向。因爲『周禮六官，定制綦詳。大司寇縣法象魏，事近任法。觀禮記儀禮所記之節文，誠有禮煩之感。讀尚書大誥，多士，多方，康誥，酒誥諸篇，更覺周人閔國氣象之中，肅殺之威，多於寬厚之德。』因之『周人統制殷民』，『以征服者壓制亡國遺民之通例推之』，則其『實行「刑新國，用重典」之政策』，大有可能頁六三、六四。

沈剛伯先生在『法家的淵源、演變、及其影響』一文自由中國第十七卷七期，民國四十六年十月，說『周人是一個紀律嚴，賞罰明，效率高，武力強的民族；而用嚴刑峻法來部勒全民，使其過一種集團生活，便是姬周開國的大政方針』頁一九八。

他的論證，大約可分爲三點。

一、周公在『康誥』裡，指示康叔治衛的方針，不外『敬明乃罰』，在『酒誥』裡，以死刑禁酒，更是『千古少有的酷刑』。康叔後來回中央做司寇，可知『衛自始便是用康誥，酒誥的教訓作爲施政標準』。

二、孔子說過，『夫晉國將守唐叔之所受法度，以經緯其民，卿大夫以序守之，民是以能尊其貴，貴是以能守其業』，可見『唐叔所受於周而行於晉的法度，該是何等的嚴密苛刻！』

三、毛詩唐風僅十二首，却是憂怨之什，幾達半數。季札一聽，便嘆其『思深哉！何憂之遠也！』『晉國強

盛，而一般平民竟會思深憂遠，則其身所受，非極權統治而何？』以上皆見貞一九八。

蕭沈二君之說，我皆未敢贊同。現在分幾點來討論。

一、研究古代實際的政治情形，第一應當注意的，自然還是正史。照史記的記載，周先的公劉和太王，都是『積德行義』之君，太王以不忍『殺人父子而君之』，才遷國岐下。文王更是『篤仁，敬老慈少，禮下賢者』，曾獻洛西之地於紂，以請去炮烙之刑。國內『耕者皆讓畔，民俗皆讓長』，使前來爭訟的虞芮之人，自慙而去。武王『修文王緒業』，伐紂克商。『釋箕子之囚，表商容之閭，散鹿臺之財，發鉅橋之粟。縱馬於華山之陽，牧牛於桃林之野，振兵釋旅，示天下不復用』。成王繼殷命，襲淮夷，『民和睦，頌聲興』。康王得召公畢公之輔，知王業之不易。『成康之際，天下安寧，刑錯四十餘年不用』以上皆見周本紀。

文武成康，四代都是仁德之君，不但史記上的記載是如此，其他周秦兩漢時代的書籍，所記載的似乎也莫不如此。詩書論孟，固不必說，此外如：

(1)墨子引『泰誓』上文王若日若月之言，以讚文王之兼愛天下之博大兼愛下；稱文王學闔天泰廟於臯罔之中尚賢上；說武王染於太公周公，而爲天下仁義顯人之所必稱所染。

(2)莊子稱文王迎臧大人而授之政田子方；

(3)荀子稱文王載百里地而天下一伸尼；武王以百里之地義立而王王霸；禹湯文武爲仁義之兵議兵；

(4)呂氏春秋讚文王辭千里之地，以請去炮烙之刑順民；

(5)淮南子述武王之伐紂及周公之服四夷皆見泰族訓；

(6)管子稱殷民舉首而望文王，願爲文王臣形勢解，以及武王之有臣三千而一心法禁；

(7)晏子春秋稱文王修德而不以要利內篇問上第二十三。

這些書籍，對於周初的君王，無不是贊揚其仁德，甚至於偶而可能還有點過實之處，例如淮南子說成康二王，『繼文武之業……非道不言，非義不行，言不苟出，行不苟爲，擇善而後從事，』主術訓，但從來沒有哪個人說過他們是刻薄寡恩。所以『周室』和『仁政』兩詞，在古人字彙中，幾乎成了同義字。漢宣帝回答他太子之諫，說『漢室自有制度……奈何純任德教，用周政乎？』漢書元帝紀。唐武后時，周矩上書，說『周用仁而昌，秦用刑而亡』新唐書刑法志，這些話，都很明顯的說明了過去人對於周朝政治的一般看法。

二、要談周室初期的政治，自然一切要看開國時的幾位君臣。現在我們把文武周召四人，就古書中所記載的，觀察一下。

①文王是以『小心翼翼』大雅文王之什，大明，『慈和』祭公謀父語，史記周本紀，『惠和』司馬侯語，左傳昭四年等見稱的。他『視民如傷』孟子，離婁下，當時人稱『文王之民，無凍餒之老者』盡心上。所以伯夷和太公，這兩位『天下之大老』，先後聞而歸之盡心上。他後來『三分天下有其二』論語，泰伯，但仍然『帥殷之叛國以事紂』左傳，襄三十一年。孔子對之，十分贊嘆，說『周之德，其可謂至德也已矣』泰伯。他曾告訴過武王，說他一生所服膺的，是『厚德廣惠，忠信愛人……不爲驕侈，不爲靡泰』汲冢周書，文傳解。在他死過了六百多年之後，人們還一直在說『文王之功，天下誦而歌舞之……文王之行，至今爲法』北宮文子語，左傳襄三十一年。所以無論如何，文王應該不會是提倡嚴刑峻法的第一個人。

②武王也是一個『有盛德』之人太雅，下武序，他『續太王王季文王之緒』中庸，而『能廣文王之聲』大雅文王之聲序，看他事父之道，就依文王之事王季，『帥而行之，不敢有加』禮記，文王世家。周書泰誓裡，記載他的許多話，如同『予小子夙夜祗懼』，『吉人爲善，惟日不足』，『天視自我民視，天聽自我民聽』，『百姓有過，在予一人』，『予克受，非予武，惟朕文考無罪；受克予，非朕文考有罪，惟予小子無良』，他伐紂到了殷郊之時，饑繫自解，

他左釋白羽，右釋黃鉞，勉自爲係呂氏春秋，不苟。克殷之後的許多善政，前面已經略述。踐阼三天，太公授以丹書之訓，他『惕若恐懼』，退而爲銘於各種器物及起居坐臥之處，以自警戒大戴禮·武王踐阼。還鎬之後，他『憂未定天之保安』，徹夜不寐，和周公講了許多戒慎恐懼之詞史記，周本記。孟子曾以『至仁』許之『以至仁伐至不仁』：盡心下。所以他也不像是一个提倡嚴刑峻法的人。

(3)周公無疑是周室初建時最重要的人物。他在武王病重的時候，曾經向太王王季文王禱告，願以身代武王尚書，金縢。武王死後，他行天子之政七年，『一沐三握髮，一飯三吐哺，起以待士，猶恐失天下之賢人』史記，魯世家。成王長大，他反政成王，北面就群臣之位史記，周本紀。尚書『無逸』記載他的話，有『亂罰無罪，殺無辜，怨有同，是叢於厥身』幾句，這豈是主張嚴刑峻法的人所能說出來的？孔子對於周公，最爲傾倒，曾有『久矣吾不復夢見周公！』之嘆論語，述而。孔子是殷人之後，一生提倡仁心仁政之人。如若周公曾經用重典以壓制亡國遺民，而孔子祇爲了要作『周之順民』蕭何思想史，頁五七，就不惜故意對之誦揚如此，又何以爲孔子！

(4)召公在周室的地位，是僅次於周公的。亂臣十人，以周召爲首；尚書，泰誓，孔氏傳，他是文武成康的四朝元老。他曾以文王之教，治理南國，而風化大行，看毛詩召南裡的幾首詩歌，真是太平盛世，而『甘棠』三章，充份說明了他的遺愛在民，尤爲千古美談。祇就此一端而論，他就不會是一個主張嚴刑峻法的人！

周朝開國時的四位君相，文武周召，都不會是主張嚴刑峻法的人，那麼，周人嚴刑峻法之說，就非常缺少根據了。

三、現在再就蕭沈兩君提出來的論證，指出它們似乎不甚站得住的地方。

(1)蕭君據周禮之制，謂事近『任法』。據禮記儀禮所記，認爲有『禮煩』之感。但周禮即不如何休所云，出於六國之季，但其非周公所定，而爲孔孟之所未見，則可斷言皮錫瑞三禮通論，所以也就不足據爲論證。禮記乃漢人著

作，儀禮也有古文今文之辨，那麼，兩書的時代及真偽，也就有了問題。而且就是姑認二書爲可靠的話，那麼『禮煩』和『刑重』之間，也還有一大段的距離。（禮和刑之間，是否有一種互爲消長的關係存在着，倒是一個十分值得研究的好題目。）

(2) 蕭君在尚書大誥，多士，多方諸篇中，感到『周人肅殺之威』。然而大誥是周公東征前聲討叛逆之文，多士，是用以誥戒遷往成周的殷之頑民，多方是伐奄歸來，安撫四方者，這些都是有所爲而發之言，那麼偶爾有兩句話稍微嚴肅些，也很自然。雖然如此，這幾篇裡，也還有不少戒慎恐懼之詞。例如大誥裡：『予惟小子，若涉淵水』，『知我國有疵』，『允蠹鰥寡』，『懋我民，若有疾』；多士裡：『非我小國，敢弋殷命』，『惟天明畏』；『明德恤祀』，『予一人惟所用德』；多方裡：『明德慎罰』，『惟聖罔念作狂，惟狂罔念作聖』，『克堪用德』等等，也未嘗不可以說是慈祥愷悌之情，溢於言表。所以沈先生在尚書裡爲周人嚴刑峻法找證據時，也就沒有把這三篇提起。

(3) 康誥酒誥兩篇，是蕭沈二君全都提出過的論證。不過酒誥之作，是因爲殷人有沉湎於酒的惡習，所以不得不用重刑以警之，如同現在我們之用死刑來禁止製造或販賣鴉片。戰亂時期肅清烟毒條例第五條。然而其中也還一再提出『畏天』，『人無於水監，當於民監』，『勿庸殺之，姑惟教之』等等。如果酒誥所言，真是千古少有的酷刑，那麼似乎不應該要等到今天才被人發覺——屈萬里先生解釋酒誥，認爲要處死刑的是周人，殷人則得到寬恕。他根本認爲周初所用的乃是一種『懷柔政策』：和蕭沈兩君見解，恰恰相反見『周初的刑法思想』，載民主評論九卷十一期（民國四十七年六月）——至於康誥，裡面更充滿了『明德慎罰』，『若保赤子』，『無或刑人殺人』等語句。何可因此便斷定康叔必然成爲用重典的刑名專家！季札聞鄖鄙衛之詩，說『美哉淵乎！憂而不困者也。吾聞衛康叔武公之德若是，是其衛風乎？』左傳，襄二十九年。季札曾經『先聞其善』。若此，則康叔不像是以『用重典』的統治方針來作爲他施政標準的人。

(4) 孔子勸晉國應該守『唐叔之所受法度』。左傳昭二十九年，是主張用不成文法而反對用成文法的表示，並不足以證

明這些法度之嚴密苛刻。季札一聽唐風，便嘆其『思深憂遠』，然而他乃是從這裏看出他們是陶唐氏之遺民，因為『非令德之後，誰能若是？』左傳，襄二十九年，那就未免和『極權統治』相差好遠。而且國風裡的詩章據說大都採自西周晚期，而晉之強盛，乃文公以後之事，那麼中間還隔了一百四五年。沈君所言，似乎犯了「時間顛倒」anachronism 之病。

四、中國過去，喜歡作翻案文章的，代有其人。對先賢有貶詞，甚至於開玩笑的，在周秦諸子中，也數見不鮮。例如莊子說伯夷叔齊到了岐陽，周公來與之『要盟』讓王。韓非子說文王使用『間諜』以亂紂心內儲說下第三十一，周公稱『官治必有賞罰』解老。淮南子譏文王舍伯邑考而立武王爲『非制』，十五歲而生武王爲『非法』氾論訓。但從來沒有人說過周人之用嚴刑峻法。

王充是一位目光如炬，辨虛證妄的大師。他曾經說過，武王伐紂之『兵不血刃』，和成康『刑措四十餘年』兩種說法，都不免有言過其實之處前者見論衡「語增」，後者見「儒增」。但他也未言周人之嚴刑峻法。如果周初真有嚴刑峻法之事，而詩書左傳上有確實的佐證，那麼這樣重要的問題，他應該不會留着給後人去發現。

五、大凡後人對前人的翻案文章，能成立的，總不出三種情形。①顧忌已失，於是敢言前人所不敢言；②從一種新的觀點——就是說有了新的概念——來研究舊的問題；③有新的證據發現。而在蕭沈兩君所討論的問題中，這三種情形，似乎都不存在也。

附 註：前文排印以後，偶翻梁任公『先秦政治思想史』民國十一年著，中有下面一段：『……儒家盛言文武周公以禮治國，衛諸侯故，殆未必然……書經中康誥酒誥等篇，言刑事綦詳，可見其視之甚重……飲酒細故，而科死罪，倘所謂「刑亂國用重典」耶？』頁四九。那麼在蕭沈二君之前，任公先生已有類似的表示。但不知蕭沈二君，會否注意及之耳。

## The Benevolent Government of the Early Chou Emperors

Dr. Hsu Dau-lin

*Professor of Law*

Profs. Hsiao Kung-chuan and Shen Gang-bo recently advanced the theory that the Early Chou Emperors ruled not with love and benevolence, as the Chinese tradition had it, but followed rather a policy of severe punishment and strict command. Their opinions should be challenged under the following aspects.

First, in the Chinese classics the Chou Government is praised as exemplary and benevolent without any reference to harsh rule. Actually, beginning with the Han Dynasty, the Chou Emperors and Benevolence became synonymous. The personalities of the founders of the Chou, the first two Emperors and the first two Prime Ministers, do not support the Hsiao-Shen thesis. All of them were equally kind-hearted and genuinely modest. One can hardly imagine that anyone of them could have been an initiator of severe government.

None of the passages in Shihching, Shuching and Tsochuan - cited for their arguments by both Hsiao and Shen - in their traditional interpretation, spoke of harsh government, but contrarily, all of them rather support the opposite view. Indeed, one writer recently took one of the passages as evidence for the early rulers' policy of "appeasement".

Finally, there is a series of ancient writers who loved to contradict traditional views and who indeed made many derogatory remarks on the Chou rulers, but nowhere has their benevolent government ever been questioned.

Thus, Hsiao and Shen have nothing in support for their postulate but their private interpretation of historical documents. However refreshing their idea, it certainly does not warrant the reversal of traditional history.

